尼采与鲁迅：新加坡的“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张钊贻

2012年11月22—2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举办了“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尼采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出版物是1902年，也就是说，2012年是尼采的名字进入中国文化圈的110周年。南洋理工大学重视文化传播交流的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研究为大学的四大支柱之一。“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所以得到支持，并非偶然。

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洲、斯洛伐克、奥地利及新加坡本地，其中多位是国际知名的“尼采在中国”研究专家和开拓者，更多的是新近取得突破和成果的研究新进。会议规模不大，应邀参加的学者和宣读论文者共11人。会议分四场，一场“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一场“尼采在中国：翻译与文学”，两场专门讨论“尼采与鲁迅”。由于会议规模不大，宣读和讨论时间充裕，因此大家交流很深入，也很尽兴。

新加坡“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高利克的《我的〈尼采在中国四十年〉》一文，回顾了他的先驱之作《尼采在中国》发表后的研究发展，以及他推动这项研究的各种努力，其中有学术总结，有亲身经历，有个人感受。高利克近年的研究重点其实已转移到基督教和《圣经》。这次能够请到他与会，实是十多年前的学术承诺。对于他，似乎已成了一次总结，一个句号。

在“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一组中，梅贝尔·李（陈顺妍）作为推动“尼采在中国”研究的先驱之一，也是高行健的翻译和研究专家，她的《高行健对尼采的对立态度》一文是理解高行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尼采热”很重要的文章。高行健的尼采似乎更靠近卡缪的尼采。他对尼采的批判跟高利克的回顾和总结隐约有某种精神联系或时代共通性，可能会构成世界“尼采接受史”的新篇章，或最后一章。也许“尼采已死”，也许尼采真该死了。

黄怀军算是尼采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进，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2007年），后来修订出版。黄怀军做博士后期间，仍努力开拓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他这次会上提交的论文《沈从文与尼采》，是对一个几乎全新领域的开发，相当扎实。若继续下去，估计还会有更大的研究成果。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尼采似乎还不会死。

两组关于“鲁迅与尼采”的讨论，文章最多，成了会议的重点，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鲁迅可以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与尼采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二是鲁迅学的发达是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深厚的学术积累容许更深入的学术探讨。张梦阳的《从鲁迅学史看鲁迅与尼采关系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从鲁迅研究史的宏观出发，以独立自由、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横向连结尼采“超人”与鲁迅，纵向连结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思想，气魄很大。李冬木的《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慎密细致地揭示围绕着“鲁迅和尼采”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比起伊藤虎丸的“个”的偏向哲学的视野和“美的生活”论战的直接思潮背景，李冬木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信息，如丸善书店、德语在明治日本等，补充了“许多曾经存在于历史现场，并且实际发生过作用而且会为今天带来启示的细节”，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所接受的尼采有很大帮助。

谭桂林的《尼采影响：鲁迅国民信仰建构思想的特征与深度》和闵抗生的《尼采：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资源》要探讨的问题有点接近，都是中国国民精神的问题，但重点和角度非常不同。谭桂林首先从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出发，归纳出三种类型的人物，提纲挈领，一下子把脉络理清。李林荣的《鲁迅尼采的踪迹意蕴》针对鲁迅的杂文，力图从鲁迅的文本本身梳理出他对尼采的看法。比起20多年前陆耀东和唐达晖的工作，李林荣的梳理自然更进了一步。文章有不少看法很值得研究者深思。我特别欣赏他用《两地书》原信去解读《拿来主义》。

张钊贻的《“折射”成黑色的“超人”》则是探讨尼采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尼采与鲁迅文艺创作的比较研究很少，《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也谈得不多，这篇算是一个补充。其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本来想避重就轻，偷工减料，不幸在会上被人提起，只好硬着头皮补上，也算是提供了鲁迅的“尼采”的“周边”的一些信息。自然，更详尽的信息恐怕还有待李冬木的挖掘，因为又牵涉到一个日本人，而且挖下去肯定不止一个。这“周边”的问题，随着大家“视界”的增长和变化，真可以没完没了，其乐无穷。

这次研讨会“尼采与鲁迅”部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请到一位研究《野草》的专家提供一篇关于尼采与《野草》的文章。还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原来设想是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但可能是组织者人脉的局限，主要还是现代文学，至于当代则连研究信息也几近阙如。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的交流过程中，偶尔听到研究者评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跟尼采的联系，但真正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起步。希望只是我孤陋寡闻。

最后一组“尼采的中译”。在中国，尼采的译介主要都是由作家来完成，是作为介绍外国文学的部分努力，所以其跟文学界的关系比哲学界的关系要更密切。冯铁的《重复的〈茶花女〉与侵犯版权：尼采翻译在中国》和崔峰的《翻译与政治之间：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尼采的语境》两个发言配搭很有意思，一微一宏，可谓相得益彰。

一个小小规模的国际研讨会，能够就讨论的学术议题做出多项突破，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实在感到非常难得；作为文集的编者，有机会读到那么好的文章，也禁不住要用一句网络常用语：学习了。对于当初的开拓者来说，这次会议也许是个总结，但从与会和赐稿的年青一代学者看来，也许是继续迈步的新的开端。不光是“鲁迅与尼采”，不光是“尼采与华文文学”，不光是“尼采在中国”，实际上是整个“尼采与华语世界”，其实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题目。尼采不能死。

印度『鲁迅文化周』

印度的『鲁迅文化周』

□黄乔生

2012年11月，我率北京鲁迅博物馆代表团到印度参加了“鲁迅文化周”。文化周的活动包括印度中国研究所与印度尼赫鲁大学联合举办的“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除《鲁迅生平展》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外，“鲁迅文化周”还有根据鲁迅名著改编的电影赏析、新德里各高校中文系学生自编自演与鲁迅及其著作相关的舞台剧、公开讲座等活动。

我们抽空参观了离住处不远的尼赫鲁大学图书馆中文书库，感觉有点遗憾，中文书实在太少。我们当即决定把携带的图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又将携带的一套《鲁迅著作初版本精选集》赠送给印度中国研究中心。但事后想，这也存在问题。他们是英语国家，应当赠给他们有关鲁迅研究的英语著作。然而，我们没有。在随后举办的学术会上，我也向印度学者提出资料来源问题：印度是英语国家，主要是英文资料，中文资料缺少。他们从哪里获得参考资料呢？年龄大一点的学者，中文可能不好，又不大熟悉网络，所以获得资料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是他们的回答。这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我想起当年鲁迅对泰戈尔产生一些误解，就因为没有看到作品的翻译。因此，我在展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表达了认真学习印度文化、了解印度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和鲁迅研究的状况和成果的意愿。我说，唐朝的高僧本来是想到西方取经的（A pilgrimage to west），却到了南方邻国印度；清朝的鲁迅本来想学习西方文化的，却到了东邻日本。这两个“设远求近”的例证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东西，无论远近，都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印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对鲁迅思想和文化遗产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现状的认识，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我这次参加“鲁迅文化周”活动，特别是聆听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的发言并与他们交流，获益匪浅。论题很多，新义迭见，我这里简单介绍，只能说是“一瞥”。

总体上说，学者们更关心的是鲁迅研究的研究。这从很多题目中看得出来，如，研究鲁迅著作的改编，研究后人对鲁迅的评价即所谓“鲁迅崇拜”或曰“鲁迅神话”等。研讨会有一个单元是“鲁迅、孔夫子和新社会主义文化”，学者们着重讨论当前中国的孔子热，并与鲁迅学进行比较，也有学者指出，现在出现一种将鲁迅和孔子弥合起来的倾向。我两年前发表了一篇关于批林批孔时期中国政治思想领域对鲁迅著作的利用的文章，不免就有这样的倾向。可惜这几位发表论文的印度学者不懂中文，几乎很少引用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几部（篇）有关论著。

与会学者对鲁迅与现实主义，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对文豪鲁迅的圣化和崇拜等论题，都有一些新见解。特别是对后一个问题“鲁迅崇拜”，有的学者并没有一味从政治利用的角度加以批判，而是从文学的神圣性角度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这是以前不多见的。

在众多“外国”中，印度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者之一，为什么鲁迅单单把印度排除在外呢？既然“除了印度”，那么，印度的书是否也像中国的书一样，让人沉静、劝人出世，而使读者与“实人生离开”呢？或者，印度的书还有别的问题？鲁迅没有把“除了印度”的原因明确说出来。我的论文追溯了鲁迅对印度文化的评价，分析了其中的缘由。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

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鲁迅论坛”

在韩国丽水召开的“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21世纪的鲁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哈佛论坛与首尔、丽水论坛

哈佛论坛：将鲁迅重新定位于跨国际文学和跨文化学的接合处

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三届学术论坛兼以“东亚与鲁迅”为主题的哈佛大学鲁迅研讨会，2013年4月5日—6日在哈佛大学成功举办。这次论坛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宾州大学助理教授兼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王晓珏共同组织，由国际鲁迅研究会、蒋经国基金会、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东亚系和费正清中心联合主办。总共有29位来自亚洲、北美与欧洲的论文发表人参与，其中包括国际鲁迅研究会（ISLS）的代表与不少著名的鲁迅专家。

王德威教授、朴宰雨教授、王晓珏教授在开幕式发言，接下来的两天内共进行了9场论文发表。

此次会议的学术目标之一是将鲁迅重新定位于跨国际文学和跨文化学的接合处，所发表的论文对主流的鲁迅研究多有反思，探索了如何用对话性的方法来阅读鲁迅，积极开拓把鲁迅与其他东亚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地。如第三场“翻译与人类环境”包含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罗鹏的《鲁迅、翻译与“造人芽”》、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助理教授王璞的《间接翻译和普罗米修斯之痛：再论鲁迅的“硬译”》，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生马筱璐的《疯癫的跨文化传播：鲁迅，〈狂人日记〉解读》。再如第6场“华语语系里的鲁迅论述”有香港教育学院文学院院长陈国球教授的报告《鲁迅的香港因缘：三个时刻》、马来西亚佈特拉大学教授庄华兴的报告《新马华文教育运动中的鲁迅精神与思想》、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蔡建鑫的报告《鲁迅的台湾追随者：从赖和到陈映真》，和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教授海孟德的《鲁迅，东亚，与现代性》。

此次论坛，还涉及到鲁迅与东亚的报告发表。它们中从多样的观点探索而有相当力度的报告不少，如哈佛大学的日籍博士生桥本悟的《跨国界寓言：在东亚鲁迅作品的互文化，1937-1945》等报告。其中涉及到日本与鲁迅关系的，有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慕唯仁的《创造新的世界的政治：竹内好与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比利时根特大学邬可贤教授的《中文：文学—科学—政治：论战时日本之鲁迅接受（太宰治与竹内好）》、罗格斯大学宋伟杰教授的《暗室孤灯，空城内曜：鲁迅、鹤见佑辅、北京》。涉及到韩国与台湾、伪满洲、东南亚的有韩国梨花女大洪昔杓教授的《为了想象东亚共存—鲁迅与“朝鲜”》、日本爱知大学黄英哲教授的《〈藤野先生〉到台湾》、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李文卿教授的《鲁迅之后：“战争期”（1937-1945）的满系文学》、首都师范大学张松建教授的《国民性、个人主义与社会性别：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等报告。

大体上看似旧题重谈而旧中有新或者超过以往力度的，就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的《鲁迅与俄罗斯文学》、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全炯俊的《幻灯片事件的诠释与翻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张钊贻的《冯雪峰支撑鲁迅“左联”盟主地位的艰难处境》、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教授罗福林的《深不可测的矛盾：早期对鲁迅“野草”的反应》、韩国朝鲜大学金河林教授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以鲁迅〈野草〉解释为中心》、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陈琍敏的《生死绍兴：鲁迅与戏剧的复活潜力》、同大学博士生应磊的《进化论与佛教的相遇：鲁迅手植（制）的一粒双生种》、日本成蹊大学教授汤山土美子的《开拓“平民的时代”：在鲁迅晚年思想中的“弱者”概念的特点与思想意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汤思奥的《后殖民主义、阿Q及农民》、美国维克深林大学教授若岸舟的《鲁迅与群众表现的政治》等多篇报告。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几篇从宏观的观点或者根本的角度思考鲁迅研究或者阅读鲁迅问题的报告以及总体分析中国鲁迅研究情况的报告，那些就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的《鲁迅与方法》、密西根大学教授唐小兵的《我们今天怎样阅读鲁迅：关于范式与参照的思考》、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葛涛的《中国鲁迅研究的现状报告》。

在座有100余位波斯顿地区的观众。听众的反响很热烈，讨论的问题也敏锐。这次论坛，由美国哈佛大学与国际鲁迅研究会合作组织并举办，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的国际鲁迅论坛。

首尔论坛：突出“鲁迅与韩国抗日作家”等主题

“2013年国际鲁迅研究会第四届学术论坛”于6月14日在美丽的韩国外国语大学和丽水全南大学隆重召开。会议由国际鲁迅研究会、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韩国外国语大学、全南大学等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印度、越南、比利时和韩国各大院校的50多位鲁迅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以“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21世纪鲁迅研究”与“鲁迅与韩国抗日独立运动”为题，对鲁迅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展开了颇具深度和广度的研讨。

大会由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朴宰雨教授致开幕词。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白永吉、吉林大学原校长刘中树、东京大学教授代田智明以及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海孟德分别致欢迎词和祝词。

接着，刘中树教授、朴宰雨教授和代田智明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刘中树认为，鲁迅和辜鸿铭的文化认同都建立在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之上，但两者的不同在于鲁迅是出于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诉求，而辜鸿铭的重估则希望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的“现代病”。朴宰雨着重分析了韩国无政府主义抗日独立为什么和鲁迅接近这个问题，并指出他们更看重反抗强权以及表达对现实不满的革命精神。代田智明认为，在鲁迅的书写中，赞扬“战士”的微乎其微，更多描写的是“战士”的破灭，因此，无常鬼的形象才最切合鲁迅的思想。三位的报告反映了东亚三国鲁迅研究的关注重心和不同特色，呈现了东亚鲁迅研究的丰富面貌。

来自韩国的几位学者分别就“鲁迅与韩国抗日作家”作了饶有兴味的发言。东西大学的金彦河教授以作者的精神再生为切入点，将鲁迅的《狂人日记》与韩国申采浩的《梦天》作了深度解读与比较。梨花女大的洪昔杓教授论述了柳树人翻译《狂人日记》以及拜访鲁迅的动机与意义，追溯了第一位外译《狂人日记》的柳树人与鲁迅的交往。延世大学的千真教授以西湖经验为切入点，把1920年代中、日、韩的鲁迅、芥川龙之介和李东谷作了比较。江原大学的李宝暻教授则通过鲁迅对《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翻译的延宕态度，再论了鲁迅的“国民性话语”。

在论及“21世纪的鲁迅研究”时，吉林大学的张福贵教授将鲁迅研究归纳为三种主要研究范式，主张把鲁迅思想的当代性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范式提出，强调“普及鲁迅”的思想。武汉大学的陈国恩教授指出鲁迅研究应回归鲁迅、回归学术、回归研究者自我和研究者对历史的承诺。山东大学的吴钧教授在研究“鲁迅诗歌的翻译与世界传播”方面独树一帜。她认为，比起鲁迅的小说，鲁迅的诗歌翻译数量很少，在英译本中鲁迅的诗歌研究与翻译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比利时根特大学陈恒博士认为应将历史处境还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与中国共同经历的“救赎史”的幻灭中去考察，这是21世纪鲁迅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即同时性。

首尔论坛还就“东亚语境下的鲁迅研究”进行了研讨。黄健教授提出“‘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智慧……在此基础上，发扬鲁迅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传统，将成为东亚文化深层次沟通和交流的新切入点。”日本九州大学教授秋吉收从鲁迅的《野草》与日本近代文学的关系探讨了鲁迅对诗的认识，指出在鲁迅心目中只有“诗”才是最高尚的文学艺术形式。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同处于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对鲁迅的接受是从1928年开始的。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讲师阮氏明商从翻译、研究、创作三方面梳理了越南对鲁迅的接受路径，并分析了鲁迅对越南作家的影响。文学是相互借鉴的，鲁迅的创作也受到俄国、日本等文学的影响。同济大学钱红教授把鲁迅的小说《药》和俄国现实主义大师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黑手的人和白手的人》作了比较，指出两部作品都深刻揭示了“享用牺牲”者的悲剧，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共鸣。

此次论坛还对一些不被重视的领域进行了新的饶有趣味的研究。鲁迅博物馆的葛涛先生考释了鲁迅书信的附件，指出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中，有多封鲁迅的书信被全集的编者删改过，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华东政法大学吴敏教授的论文《鲁迅涉法写作的独异性及其文化价值》更是视觉独特、新颖。她认为“鲁迅总是把他最想加以否定，最要给予辛辣的批判或鄙夷的一切，都放在法律体制的形态框架下，放在法律的环境之中”。韩国外国语大学年轻学者徐榛论述了鲁迅笔下的“蛇”。他认为鲁迅想通过蛇所拥有的野性、毒性、反叛性和任性，寻找到国人所丧失的本质，而这正是改变社会的原始力量。

丽水论坛：“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鲁迅与现实社会

大会于第二天移师韩国南部美丽的全南大学丽水校区继续进行。全南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严英旭等几位分别致祝词。丽水论坛就“新世纪的鲁迅研究”等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讨。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海孟德在“今日中国与鲁迅”的发言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话语日益远离鲁迅，这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国外学者看来是很可惜的，中国要想建设一个公平的新社会，还需要鲁迅精神。北京二外的李林荣教授从宏观上分析了鲁迅研究的全球本土化态势，并指出：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应沉着、冷静地从海外同仁的论著中，分辨出值得认真深究和不需要枉费周章的议题，并转化为有利于自我省察的镜像和一幅指引自己向前探索的路线图。吉林大学张从皞教授对鲁迅在国民心目中日益严重的模糊化、边缘化、灰色化、娱乐化倾向提出批评，认为鲁迅要走向民间，走入民心方能实现其思想的真正延续与更生。

鲁迅作品在海外影响最大的要数《阿Q正传》了。根据《阿Q正传》改编的舞台剧也有不少。日本聂南大学濑户宏教授对宫本研在《阿Q正传》基础上再创作的同名话剧作了比较，认为日版《阿Q外传》虽然借了鲁迅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却融入了宫本研的鲜明个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香港岭南大学年轻学者杨杰铭认为：海外真正将鲁迅带入学术领域的华人是夏济安和夏志清兄弟。夏氏兄弟的鲁迅论述是最贴近“人的鲁迅”的解读。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的杜文晓博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前鲁迅作品之所以在越南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越南的历史语境适合接受鲁迅充满革命思想、爱国之心的作品。韩国研成大学崔允瑄教授则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了鲁迅文学对李陆史投身革命的影响。香港《文学评论》总编林曼叔认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春勇从“文章学”的视角切入鲁迅的写作，认为鲁迅的杂文是一种“体制外”的写作，鲁迅为了增加文章的生趣和开阔度而使用杂文的手法。这对理解鲁迅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韩国朝鲜大学金河林教授在“鲁迅与文化大革命”的发言中，用大量丰富的原始资料证明了文革期间鲁迅如何被四人帮利用，又因毛泽东的经典评价，最终被打造成思想精神权威的过程。

本次会议共有29篇论文在会议中发表，期间，与会学者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对话，真正实现了“和而不同”的学术宗旨，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后，主办方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考察节目，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了顺天湾世界庭园博览会等以及光州5·18民主运动纪念馆。鲁迅思想曾激励李泳禧等韩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参与民主化运动。本论坛的组织者朴宰雨教授也曾经受过他的影响。鲁迅对于东亚乃至世界的意义的一端也正在于此，并且仍将一直延续。

陈琍敏（哈佛大学）、吴敏（华东政法大学）、金英明（韩国外大）